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近代《墨辩》“复兴”研究

姓 名: 张斌峰

年 级: 92 级

专 业: 逻辑学

研究方向: 中国逻辑史

完成日期: 1995 年 3 月

导 师: 温公颐

南开大学哲学系

一九九五年四月

Abstract

The thesis, by introducing the methods of culturology and hermeneutics, examines,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orough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cause of the revival of "Mo Bian". The thesis recapitulates the basic lines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research of "Mo Bian" in the three periods in modern history in which "Mo Bian" resuscitated, revived and re-prosperou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o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of textual research of "Mo Bian" in early modern times, the thesis comprehensively checks and assesses the achievements and misakes of the modern scholars exigesis explanation and research about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Mo Bian", term (ming), proposition (ci), inference (shuo), argument (bian), criticizes the method of analyzing "Mo Bian" system with western traditional theory of logic, and advances a unique viewpoint about "ming", "ci", "shuo", "bian".

For the purpose of complete examining and re-inspecti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research of "Mo Bian" in modern history and providing new clue and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of "Mo Bian" in the future, the thesis, by analyzing a great many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igures, summarizes and abstracts two most representative methods of "Mo Bian" research, the method of exigesis and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logic, both of which carried through the whol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 Bian" 's modern revival.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culturology and hermeneutics to the possibility of research of "Mo Bian", advances that "Mo Bian" is a polysynthetic cultural complex which appeared in pre-Qin cultural background. Through analyzing this cultural complex and its internal relations, the thesis has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 Bian, affirmed its position and value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provided referential theory and method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ulture, in order to realizing the real revival of the research of "mo Bian".

Key Words:

The modern revival of the research of Mo Bian

Hermeneutics, Creative hermeneutics, Culturology cultural complex

论 文 提 要

本文引入文化学与解释学的方法首次把《墨辩》作为一个由文本形式承载的文化复合体，来全面、系统地考察、评述和论述其在近代“复兴”的历史文化背景、历史过程与特点；总结近代治墨者们对《墨辩》文本的校勘、注释的考据学研究成果；全面概括、清理了近代学者对“名”、“辞”、“说”、“辩”的义理研究，在批判以西方论理学套析《墨辩》义理体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名”、“辞”、“说”、“辩”的具体解释与见解。

本文还首次总结，~~探讨~~^{过中}了贯穿近代《墨辩》“复兴”全部^{评述}程度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乾嘉考据学和近代^{文化}比较逻辑研究法的得失。通过对它们的回顾与反思，探讨了引入运用解释学和文化学方法研究《墨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提出了《墨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多元文化的有机复合体的新界定。认为在这个复合体中，辩学是其核心，并探讨了它与其它文化分支具有内在统一与自我相关性。作者还进一步认为墨辩的义理体系应在对《墨辩》这一文化复合体的整体全观中，才能全面“回归”、“归根”，而凸显其内在文化特征与精神，确认其在传统文化与文化重构中的地位与价值，为新世纪的文化建构提供可资用的理论上的方法论上的借鉴，从而使《墨辩》有可能在世纪之交的新文化构建中，得到真正的复兴与弘扬。

关键词：近代《墨辩》“复兴” 解释学方法 创造性诠释学方法 文化学方法

目 录

英文提要	(1)
中文提要	(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近代《墨辩》“复兴”的必要性	(1)
第二节 研究近代《墨辩》“复兴”的方法	(2)
第三节 需要说明的几个概念和问题	(6)
第二章 近代《墨辩》“复兴”的文化背景	
第一节 乾嘉考据学与墨学的复苏	(8)
第二节 西学输入与《墨辩》“复兴”	(14)
第三章 近代《墨辩》“复兴”的历史过程	
第一节 乾嘉复苏时期	(26)
第二节 晚清复活时期	(28)
第三节 民国昌盛时期	(30)
第四章 近代《墨辩》的考据学研究	
第一节 《墨辩》六篇的作者之争	(35)
第二节 《墨辩》编制的研究	(40)
第三节 《墨辩》六篇的内容与性质	(43)
第五章 关于“名”的研究	
第一节 名、名实观与名的种类的研究	(50)
第二节 “正名”与“过名”的研究	(54)
第三节 名与辞、名与辩的关系之研究	(56)
第四节 “名”的研究之得失	(57)
第六章 “辞”的研究	
第一节 “辞”的界定与分类	(60)
第二节 “立辞”及其法则	(62)
第三节 “辞”之种类	(63)
第四节 《墨辩》的“周延说”	(66)
第五节 近代“辞”的研究之评述	(71)
第七章 “说”的研究	
第一节 “说”的释义与性质	(74)
第二节 “说”的具体形式及其性质	(78)
第三节 “说”的法则与谬误	(85)
第四节 “说”的研究之得失	(87)

第八章 “辩”的研究	
第一节 “辩”的界定与特点	(91)
第二节 “辩说之道”	(94)
第三节 “辩”的法则与“辩”的谬误	(98)
第四节 “辩”的研究之得失	(100)
第九章 近代《墨辩》研究法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节 乾嘉晚清时期的《墨辩》研究法	(104)
第二节 民国时期《墨辩》研究的比较法	(110)
第三节 近代《墨辩》比较研究法的反思	(117)
第十章 近代《墨辩》“复兴”与解释学	
第一节 乾嘉晚清时期对《墨辩》的注释	(121)
第二节 近代对《墨辩》的注释向义理解释的转向	(128)
第三节 《墨辩》的创造性诠释	(132)
第十一章 作为文化复合体的《墨辩》	
第一节 以文化全观《墨辩》的必要性	(139)
第二节 《墨辩》的哲学本体论与墨家辩学的内在统一性	(140)
第三节 《墨辩》的认识论与墨家辩学的内在统一性	(141)
第四节 《墨辩》的科学思想与墨家辩学的相关性	(144)
第五节 《墨辩》的功利行为观与墨辩的相关性	(147)
第六节 《墨辩》的语言观与墨辩的相关性	(149)
第七节 从《墨辩》的文化特征看墨辩	(155)
第八节 走向新世纪的《墨辩》	(160)
主要参考书目与文献	(166)
后记	(169)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近代《墨辩》“复兴”的必要性

墨家辩学是先秦时期墨家创立和提出来的，一种重视科学理性分析、重智识、重功而利行的论辩理论与方法。承载墨家辩学的《墨辩》是一个以墨家辩的精神与理论为核心的，统摄墨家的哲学本体论、知识论、科学论、语言观和功利行为观等的文化复合体。由于《墨辩》文本是先秦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体现着墨家先秦的科学思辨与论辩精神的经典，它因承载着、反映着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独有的思想体系而蕴涵着无数深邃思想与观念。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重建新文化，绝不应当依然是儒、释、道的重现。显而，应是多元、多家文化的整合、综纳、交融、创新与发展。正因为如此，作为反映墨学核心思想精神与方法的《墨辩》，在又一个世纪之交的文化抉择、文化重构之中，必应当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因为它所代表与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多元文化整体中的一个不可分割、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新儒家的研究正全面展开，新道家的研究也初见端绪，惟独新墨家尚无人问津，更别谈具体化地从经济现代化、伦理、经济、科学理性与文化重建的需要上，去观照《墨辩》在现实价值层面上的研究，就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墨学史或《墨辩》研究的发展史也尚未问世。

作者以弘恢墨家的文化精神，光大墨家的辩的精神与辩的理论文化为己任，率先截取墨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近代《墨辩》的“复兴”为研究对象。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墨辩》“复兴”的研究是局部的、片面的。尚没有把“复兴”作为一个文化形态，从构成这种文化形态的多种要素及其关联上，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对“复兴”进行富有立体感的研究，这包括：《墨辩》“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根本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和深刻的解释；近代《墨辩》研究而“复兴”在整个近代文化中的特色、地位和作用也同样没有得到客观、全面的认识；由近代研究者的视野与境界所决定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是否单一？是否合理？他们对《墨辩》六篇的校注、注释、义理研究是否合乎校勘训诂学或解释学的义理规则与原则？无论是从墨学学术史的研究，还是从墨辩发展或中国近代逻辑史的研究上看都急待重新研究。如从中国近代逻辑史研究上看，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对墨辩的比较逻辑研究是开创性的，但又是在没有全面理解和把握两种理论形态的全貌、实质的情况下，把墨辩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这样的比较是以求同、求“相契”者为主导，以致于以西方逻辑而替代墨辩，其结果是《墨辩》研究成了传播、输入近代西方传统逻辑的载体和举例的工具而已。但是由于胡、梁是近代《墨辩》学说、义理研究的开创人，他们的比较研究的影响深远，以其巨大的惯性力量波及和干扰了当代《墨辩》研究。所以对近代《墨辩》的比较逻辑研究也需要加以清理，从而直截了当地去存优。另外，近代学者的《墨辩》研究各领风骚，各具特色的一个重要缘由是他们各自承继与吸取了不同学派的、各具特长的学术研究方法，但迄今还没有对这些《墨辩》研究方法的源流、要义、实施原则作出全面的整理和综合，以为今后的《墨辩》研究提供金戈利剑。

在本文中，作者力图尝试性地结合近代墨辩复兴的历史文化背景，选择适合于研究对象的多元范式与方法，研究“复兴”的历史过程和内在历史联系，评述近代墨辩研究者对《墨辩》文本的注释与诠释，总结近代《墨辩》的研究方法，提出建构墨辩新体系的设想，为重构新世纪

的科学和人文、智识与价值、实质与形式统一的新文化而提供可以资用的理论方法的先导和资源。

第二节 研究近代《墨辩》“复兴”的方法

一、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是按照历史的自然过程，通过具体事物和事实或人物，真实地叙述和生动的描写、再现历史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规律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换言之，它是依据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的先后顺序、前后传承、发展阶段，抓住具体事实进行描述，形成一幅精妙而又富动感的图画，翔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历史方法的运用，要求立足于现有的历史材料，追溯过去，叙述被研究对象从产生到完成的特定时间界域的具体过程，而寻求它们的本质联系，为逻辑方法上的理想化、体系化提供必要的前提。也因此，历史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对近代《墨辩》“复兴”采取历史方法的叙述与历史的评价，是作者首先且又是首要的应该运用的方法。历史方法的应用机制与程序规定着，研究近代《墨辩》“复兴”，必须考察它所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生的文化背景，进而把近代《墨辩》复兴划分为各自独立的若干历史阶段，钩深臻远，探赜索微，把握其学脉传承与内在关联，说明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在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时，作者尤其关注那些近代《墨辩》研究者是如何与历史方法或历史的眼光与视角研治墨辩的基本范畴、论式的源流及其发展的。

二、逻辑的方法

逻辑的方法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去揭示被研究的对象整体的规律性、本质和发展趋势。显然，它是对历史的描述的抽象与概括，也因此逻辑的方法首先要求用典型的事例、材料说明被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次后要有一个逐步展开的、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样所构成的逻辑结构就是以概念或范畴、断定、推演等理论形式体现一个要素是相互制约的，具有内在联系，又能以此推彼，逐步递进地形成一个系统的立体的复合结构。当然它肯定是被反映对象的无数规定性的内在联系的映照。

应用逻辑的方法，不仅决定着对“复兴”的客观描述、阐述不是史料的排序，而应采取理性的进去揭示“复兴”历史过程所潜藏着的、沉积下来的义理体系。这就是说，如何遵循着逻辑层次的递进与关联去概括“复兴”对墨家辩学义理的整理与解释。

墨辩《小取》明确提出了墨辩的基本框架，规定了辩的对象、辩的功能、辩的原则、辩的范畴、辩的法式或方法。但这只是为《墨辩》复兴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精简的逻辑解释和体系串联的导引。《墨辩》言简义奥，《经》上下句读旁行，《说》上、下篇经文标题首一字（或一词）；又加之《墨辩》是一个辩学所涵摄着的百科全书，这为《墨辩》的义理建构与提炼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余地。正因为如此，如何在忠于近代《墨辩》“复兴”的历史事实与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和运用适合解释、比较、评述近代《墨辩》“复兴”的逻辑工具，是逻辑的方法在本文运用的一个关键。

应该说明的是，逻辑的建构与历史的描述在本文的研究中并不是分割开来运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有机结合：即一方而逻辑体系的建构应以历史描述为基础。这就是说，逻辑体系的提升与设构是在对历史所作的客观描述的了解、分析、概括的基础上去做提升、升华、演绎出来的。另一方面，历史的描述也不是盲目进行的，而又是以逻辑为指导下进行的。这样，历史描述才能在浩瀚如海的历史材料中把握住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脉络。

三、比较法

比较是对类型的认识。类型的划分同样是科学研究（或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了解一种思想与理论形态的特征，往往需要把它与其类型相似的理论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辨其同异，揭示其特点，总结其规律性。在此意义上的比较是理论创造的前提，这也是由于比较法的运用是科学研究（或人文学科研究）求得实证材料的关键，而这又是因为这些实证材料的获得须经过比较、筛选。

每一个进行比较研究的实施者，都有着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那么具体要比什么？选择什么样的比较基点？如何避免比较过程中的主观片面、牵强附会呢？要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科学、有效地比较研究，就要遵循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可比性原则。所谓可比性原则就是当两个对象具有相同点又具有不同点时，比较才可得以进行。可比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在这种研究中必须是对两个比较的对象的整体、全貌、本质关系以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有了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再选择二者中有代表性的性质，比其同异。

比较研究的种类多种多样，可分为历史与事实的比较，深度与广度的比较，平行的与交互的比较，纵比与横比，同比与异比、同异交比等。显然，近代《墨辩》“复兴”的研究是离不开这些比较方法的运用的。因为可以通过比较寻求促进近代《墨辩》得以复兴的动因和必然性，分析说明近代研究者们对墨辩的各个观念、范畴的语言表达（校勘、训诂）和本义的解释学意义上的同与异、差别与关联。

由于近代墨辩研究者在对《墨辩》的义理、体系与原理研究历史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比较逻辑研究方法；又由于它们受到文化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的比较研究欠科学性。所以，运用科学比较法去审视与反观这些比较逻辑研究的成效的有效性或优劣，对于分析那个时代各自所达到的成就与失误，以及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对现时代的《墨辩》比较研究产生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文化学的方法

文化学的方法是作者在本文中引入的研究“复兴”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作者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即《墨辩》文本是先秦产生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复合形态，而且近代对《墨辩》研究也是近代古学复兴运动和西学输入的文化思潮的刺激与带动下的产物，它也是以一种文化形态出现的，它的兴起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文化、历史背景，它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既然它是一种文化形态就应以文化学的方法去研究它。

要掌握文化方法，得首先了解文化的界定与实质。而文化的界定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有以下特征：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表现为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多元因素的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习俗，以及社会成员和一切其它的规范、习惯、心理和思维等。文化的实质就是“人类化”，它是人类主流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创造、传播、实现自身价值的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为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也表现为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心理、思维、知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文化有着自己的内在结构，所谓文化结构是指文化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组成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方式和秩序，文化的结构决定着文化系统的类型、性质和功能。文化的多层次、多系统、多因素的结构决定着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复合体，决定着对文化系统的研究是一个宏观的整体把握。实现这样的宏观的整体把握，就是文化的全观方法。由于文化学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群和多维、多部、多层的概念体系群，它是擅长于烘托一个能网罗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人诸变量的相互体系，把一切历史和共时态的因素，主体的客体的因素，经验形态的与超经验的因素、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通过不同的符号系统和解释理论，组织到问题的“解集”中，以对所涉及社会——历史——人的复杂问题给予全观、整体的透视，所以可以说文化

的全观方法是文化学研究的最基本的、首要的方法。

全观离不开即物，离不开对文化研究对象的“事象”全面考察。通过全观在丰富的经验层次、背景、图景上进行现象、细节、资料上的分析，才能上升到概念层次上而灵活地跨越，使人得理性而又具体，总括而又可以解析的全机体认。

由于文化思辩是经验直观、经验体悟与理性批判结合的过程和结果，是一种即物穷理的概览，它是对事物与理论、感性与理性的双层超越——其中以经验、事实为前提的实证性与抽象的理论分析方法相结合，让历史批判为基础的直觉性闪耀着令人心折的理论光彩。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全观是构成文化系统的要素与要素、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间的联系中考察文化；对某一类型的文化产生的全观研究又可以使我们能够从纵深和广博、整体与部分的结合上概括该类文化产生的全貌与相互作用，从而从整体概念、诠释、显化和深化这类型的文化思想与理论。那么怎样进行文化全观呢？文化的全观的首要步骤就是要了解与展现或再现一种文化类型产生的文化背景，掌握产生某一现象的文化环境，诸如制度、习俗、传统、价值体系、生活方式、语言心理与心态、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渊源。

文化全观的方法对于考察近代《墨辩》研究来说，就是必须联系近代《墨辩》“复兴”的文化背景，即在较大的文化背景中，探讨有关“复兴”的历史现象所存在的意义，所兴起的必然性和内在原因。近代《墨辩》研究的产生是在承继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方法和在西学尤其是传统形式逻辑输入的刺激与带动下产生的。这两种文化背景的全貌与动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近代《墨辩》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对近代《墨辩》“复兴”的文化背景的考察还应注意对当时的《墨辩》研究者的文化心态的挖掘与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每一个《墨辩》研究者受着各自文化心态的制约与限制。近代中国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其文化也发生着不断的冲突变动与交融。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广泛传播，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保守性、排他性与文化的本质的包容性、开放性相互冲突，形成了当时的《墨辩》研究者的颇为复杂的文化心态。他们对西学、西方逻辑态度的恐惧、畏惧到理解、部分的认同，再到全盘接受的各种时期的文化心态的不同与他们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方法、范式的选择，使得他们对墨辩的特点、体系、作用与价值的深度与广度有着颇为密切的关联和相互区别。

从文化的全观方法出发，对近代《墨辩》的研究，还需从认识论（或知识论）、语言学、科学观、思维方式的转化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弥补单一用西方传统逻辑研究墨辩的简单化处理的缺陷，使近代《墨辩》“复兴”呈现为多元的、多样的特征。由于近代《墨辩》“复兴”过于偏重对《墨辩》所体现的逻辑学说的解释，忽视了《墨辩》是一多元的文化因素的统一体，所以很少联系《墨辩》中的人文精神与学说去研究墨家辩学的“非逻辑”的内容，为弥补这个不足，本文作者特别重视近代治墨者们从多元角度研究《墨辩》的成果的综合与评价，这显然是本人不同于前人研究近代《墨辩》“复兴”的特别之处。

五、解释学的方法

解释学（Hermeneutik）是当代西方流行的学术研究方法或范式。它源于西方古代对法律、圣经经典的神学与语文解释，它以寓意解释（Allegorischen Interpretation）为核心，类似于中国传统解释“微言大义”的方法。早期解释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解释现存的传统对原始东西的破坏与变形，以使之获新得解释。这样促使了寓意解释向经典文字研究的转化。解释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连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它是确定语言使用者说了些什么，以及他又如何实际理解他所说明的。在西方解释学的最初定义是：指通过理解把文本或作品中所蕴含的义理通过语言的解释、注释、揭示、昭明的过程和方法。在解释过程中，首先要理解，而理解应当调动一切认识手段：文字考证、句法分析、了解意义的背景（Context）等方法，去实现发现文本或作品的真

义
正的目的。

近代解释学的新超越在于：人们意识到对语言进行词源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以前几代活动的环境条件，显示解释对象的语言形式背后的意义及其关联。

当代解释学的发展表明，意义体现了人与世界的种种复杂的关系。对于各种各样的意义的解释和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任务，而是人类自己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活动的主要方面。

西方的解释学⁶⁶一般意谓从未知的东西回溯到已知的东西。解释可以分为词语解释和事物的解释。严格意义上的解释是指表示某事物的全部科学例证，或这些科学例证的一部分，但从这些部分出发根据严格的方法可以推出所有其它部分可量化的函项关系，即允许相应的量的预测的函项联系来用作解释。科学的问题是现代科学论的主要问题，但是发展到今天的解释学同样也成为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

如何进行解释活动，让我们首先看看解释活动的若干要素：①解释对象；②解释者；③解释活动，即理解活动；④解释的目的，即由解释对象、解释者和解释活动三个综合的“解释的意义”；⑤解释的目的，即由解释活动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这五个条件必须制约解释活动的水平，进而影响意义的确定。解释就是这五种要素的参与与相互作用，这样解释显现下列特征：

第一，解释活动由于解释者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参与，因而在解释的过程中一定会渗入着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就是指在解释中主体的人所带有的作为“偏知”的认识——“前理解”。

第二，由于解释活动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其中的理解活动具有历史性，历史性揭示出解释活动本身中的对象、主体的价值取向及其解释的意义。但解释的历史性表明解释本身是在一定时期下、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解释，每一次解释可能只能回答一部分问题（这也正是传统经籍需要历史地、反反复复的解释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解释者在回答一定问题的同时又提出新的问题，蕴涵着新的解释的可能。因此每一次解释不是绝对的，解释是不断进行的。

解释活动的性质表明着：要最大限度地获得卓有成效的解释，必须使解释活动遵循着两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一，解释的客观性的原则。西方解释学家指出：“只有把解释的重点从隐藏着的主观世界的情感性研究转移到作品的本身的意义和指谓上来。”[1]这样的解释要求解释出来的意义须与作品或文本（text）一致。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一致性解释呢？就有了解释的第二个原则。

第二，解释必须把解释对象（语词、经文、条律）放在具体语言环境，或选择一个涉及被解释对象的有限时空的文化意义场。例如，对语词意义的解释是在该语词和整个句子中显示出来，而对经文、条律的义理解释须在上下文或乃至类似的语言环境（旁文）中呈现出来，而不能在语言表层与客观事物、思想认识的机械对应中寻求其释义。

引入解释学方法理解分析、评述整个近代《墨辩》研究的全部过程，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从解释学意义上看，近代《墨辩》研究，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从解释的构成要素上看，近代《墨辩》研究完全具备了形成解释的要素，即：

解释的对象——《墨辩》，即被解释的文本（text）。

解释者——近代墨辩研究者。

解释活动——自清初傅山注释《大取》至1949年以前的解释事实的历史描述。

解释的目的——求得《墨辩》的文本意义和辩学的义理体系。

解释的背景——乾嘉考据学⁶⁷与西学尤其是西方逻辑的输入。

解释的工具——主要是西方传统逻辑、因明学等。

正由于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近代《墨辩》研究的生动的、壮阔的历史场域，由此可以分析、评判近代《墨辩》解释的全过程。

《墨辩》六篇作为解释对象，其中《墨经》四篇的语言表述方式多用界说与语录体，其文辞质朴，言简义精。它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转抄、传印，其误、夺、错、衍、窜、脱之处彼彼皆是。这给近代《墨辩》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他们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空间，各以自己所喜爱的工具与范式对《墨辩》六篇的语言文字与义理作多种多样的解释，呈现了多彩多姿的局面，然而这些解释是否有效？我们该如何评判呢？

显然根据解释学的要义与原则可以考察近代解释者是否在解释（注释、理解、说明）中是否带有个人的“偏知”、臆断？其意义的解释（对《墨辩》的文字校注与义理解释）是否背离了解释的文本及其背景？是否选择了适合于被解释对象与特点的解释工具？

以解释学的方法研究近代《墨辩》“复兴”的意义，远远不仅仅在于评述近代对《墨辩》的解释过程，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墨辩》整体加以关注，相互回流、作机体动感式的阐发，它力求清晰、深刻，注重系统的清晰、分明、精确和论证的充分，又力图把握与现时代之间的价值与意义上的关系，促进着他们之间的融合、沟通和重新组合思想。所以解释的基本方法的实施，是创造性的诠释的基础。对《墨辩》作创造性的诠释将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整体与其互动、重组、动感、回流关系，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了理论营养。

第三节 本文需要首先说明的几个概念与问题

一、若干概念的澄清与辨正

1. 本文的“近代《墨辩》‘复兴’”是指，《墨辩》自西汉沉寂以后，在近代又重新被重视、被研究的学术复兴运动。具体言之，《墨辩》由被冷落千余年后，在近代其文本又得到了重新整理，其辩学文化体系或在名辩学意义上或在以西方逻辑为参照系意义上得到了初步确立。“复兴”就是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兴”。

2. 墨学、墨辩、《墨辩》

墨学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所提出的以辩学为核心的有关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科学思想、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学说。

墨辩是墨家辩学的简称。墨家辩学是墨学的核心内容。它是以辩的精神与理论方法为主体的，与本体论、认识论、科学观、语言观、功利行为观内在统一的、涉及论证墨家的伦理、政治、经济学说的论辩、辩驳和抽象思辩的理论。所以本文的墨辩不等于墨辩“逻辑学”或西方传统逻辑。

《墨辩》是指墨家先秦典籍《墨子》一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它是墨家辩学的承载体，墨家辩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基本上反映在六篇之中。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1. 本文突破了那种把墨辩等于传统逻辑，而只以单一的传统逻辑为范式去研究《墨辩》的义理核心——墨辩的狭隘性、单一性，采取了多元的研究范式，但并不是要否定研究墨辩作为逻辑类型的存在的可能性，也不反对以西方逻辑与墨辩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认为不能把近代墨家辩学的发展史写成中国近代逻辑史。作者认为只有对墨辩的全部学说与理论进行全面整理、梳理的基础上，在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下先把“墨辩还诸于墨辩”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进行科学的比较逻辑的研究，但是这种比较逻辑研究只是《墨辩》研究一个方面。

2. 作者前面列举的五种研究方法，但并不是贯穿本文的每一个局部。尽管作者注意到：当以一种方法为主导时，还应尽量同时以其它多种方法辅助而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注意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选择以不同的方法，因为方法的选择是由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

读者纵观本文的内容也许会得出一个与作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相矛盾的印象，即本文评述的“复兴”的大多数内容是近代关于《墨辩》的比较逻辑研究的内容，而这似乎是与尽量用多元化的、多样性的《墨辩》研究范式与方法相抵触，但这是由近代《墨辩》研究的历史现状所决定的，即有代表性的占主导性的《墨辩》研究都是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来套析《墨辩》的。

参考文献：

[1] 闾保乐·科利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第二章 近代《墨辩》“复兴”的文化背景

近代的中国社会是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结构不断产生更迭、变动的时代，其文化思想也随之激荡，明清之际的理学与反理学学并存，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近代文化的相汇、对立、并存、融合，清末民初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新学与封建旧学的斗争并存，近代《墨辩》“复兴”正是在这样的风起云涌、变幻多端的文化历史背景中进行一种学术运动。所以，研究近代《墨辩》“复兴”必须首先考察它所缘起和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

当代台湾著名学者牟宗山在论述研究先秦诸子学的一般方法时说：“常谓治先秦诸子，当先通晓其文化之背景，藉以理解其内部之愿意，以及其展开之系统，最后当予以批评的省察，疏导其通义，以明其在一时代上之意义。”[1]由于《墨子》是诸子学，《墨辩》又是《墨子》一书中的《六篇》，而牟宗山的诸子学术研究方法论，颇适合于对近代《墨辩》“复兴”的研究，才能从历史的视角上去审视“复兴”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与根本原因，说明近代《墨辩》“复兴”对《墨辩》研究的贡献及其内在限制。显然通过把近代《墨辩》“复兴”置身其的历史文化背景，说明近代《墨辩》“复兴”过程中所运用的研究工具、学术范式的选择，研究者的心态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相应的社会需求的反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近代《墨辩》“复兴”的方向、特点。

近代《墨辩》“复兴”的文化历史背景，就是指它所产生的机制与演化脉络相关的精神（哲学、历史、科学、语言学等方面）条件。近代《墨辩》“复兴”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或文化运动一部分显然不是脱离当时文化思潮的一种孤立的学术运动。从近代文化史上看，“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学说。”[2]那么作为近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近代《墨辩》“复兴”，也必然是如此，它的产生与发展显然也表现为：一是受到乾嘉考据学文化思潮的带动，二是受到西学尤其是西方逻辑输入的刺激。

第一节 乾嘉考据学与墨学的复苏

一、理学的衰落与经学的兴起

自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就开始从其巅峰逐渐跌落下来，社会的衰落也给维护封建社会为目的的，以“天理”、“性与天道”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理学提出了新的理论难题，为适应社会变动的需要，北宋以来的理学家们（从周敦颐到朱熹）无不尝试把维系封建社会制度运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加以本体化、哲学化、永恒化的论证，以确立一劳永逸、绝对不变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准则。但是，这样绝对的、先验的准则如何衍化为俗人们所需遵循的具体行为伦理规范呢？北宋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明代中叶的王守仁提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3]的“致良知”说。显然“良知说”与宋代程朱理学一样只不过是客观唯心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的论证，同样都是以蒙昧主义为论证根据的虚玄、空洞的论证。在封建社会的衰微所产生的对儒学所产生的对儒学的新需求面前，宋明理学在义理上显现出了致命的弱点。

明末，外族的侵入，政局动荡，经济凋弊，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在这样的时世中，理学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守仁的空谈心性的王学都无法提出拯救摇摇欲坠的

明朝的新学说了。即使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颀这样的三元王将的守护士，靠力倡“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也不能挽救理学的衰落。理学失去宋明时代思辩的色彩，沦为封建道德的别称。迄于清初，理学开始终结。理学的衰落，既是封建社会危机的折射，也是中国古代儒学自身危机的尖锐反映。

这两方的危机，在理论思维领域客观地提出了以新的理论形态取代理学的课题，也从此学术思潮开始由空谈心理、门户纷争转向了经世致用，并由理学转向汉学。

这种转向和第一个方面——“经世致用”，就是把对学术研究与安邦济国结合起来。如明亡之后的思想家朱之瑜，虽然流亡日本，但终生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为治学宗旨。他极力反对明之心学的束书不观、游学无根，而主张“为学之道，在于近理著己，有益于国家，不在乎纯弄虚脾，捕风捉影。”[4]清初思想家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为学，力排宋明诸子，兼斥佛老。他反复强调学务实用，反对“空”、“虚”。他认为孔孟之后的儒学是“上者务心上之操存，而作用全无，下者攻章句之讲者，而实功尽废。盖深痛礼乐之仪文器数尽亡，而其实亦随之湮没也。”[5]在颜元看来，儒学玄于空谈，不能经世、没有功用、实证，是空学、伪学。颜元特别重视“习”（事物、事理）的检验功夫，认为思想认识要在具体事物方面求得证实，“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义上着力。”[6]“颜元的实证的知识论，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儒学，而实际上则是墨学学术的复活。”[7]颜元的这种批判理学的、实证的、唯物的知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经学兴起的先导。但“元道太刻苦，类墨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8]颜元若涉墨学则必倡墨学而代之儒学。初最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当是顾炎武。但提倡实学——实行，主张“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9]，“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同家皆学之事”，冀希望通过研究实学替代那言心性的空虚之学——理学。因此，“经世致用”必然导致批判理学思潮的兴起。

清初学术思潮的第二个转向是以经学取代理学。随着经世致用的实学的倡导，就势必要求治学方法上要进行通古今、决疑伪的考据学研究。在这种情形下，“儒学发展的必然归趋，即义理的是非取决于经典。”[10]这样出现了以经学取代理学的经典考据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中之叶，以博治著称者杨慎……次则焦竑，亦嘉考证。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11]显然这是认为清代经史考证学起于明代中叶。但持这种观点的也有某些事实为依据。如顾炎武研究古音时，所采用的“本证”和“旁证”的方法就源于明陈第的《毛诗古音异》。再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也有源于梅的《古文尚书考异》。但是真正实现理学向经转变的还是经学的开山大师顾炎武。他曰：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12]

顾炎武倡导经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他反对对《经》的主观解说，主张从文字声音入手：

“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致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不揣冒昧，僭为唐韵正一书，而于诗、易二经，各为之音，曰：诗本音，曰：易音。以其经也，故列于唐韵正之前。而学读之，则必先唐韵正，而次及诗、易二书，明乎其所以变，而后三百五十篇与卦文象象之文可读也。其书之理最为精密。”[13]

“考文”便是校勘之学，“知音”便是音韵训诂。顾氏之后的乾嘉经学基本上沿着他所提出的这种方法去整治古书，从而开辟了一个独立的知识与学问——清代经学。顾氏的经学重从考音韵，从历史变迁中寻证古经的导向；讲究以证据来考订古字音韵、文字而治学；重自经相证的直证，采他书之旁证以参证。侯外庐先生把顾氏的经学考证方法概括为八大特点：第一，重调查；第二，重直接资料；第三，理广求证据；第四，重辩源流，审名实；第五，重明古今史学；第六，重存疑，不盲从；第七，重虚怀广师；第八，重手脑并用。[14]顾氏倡导的这种

经学考证方法相比于虚玄空谈的理学，可谓是一剂划时代的学术革新。

顾氏开创的经世致用的经学，在清初很快就（导致 经学产生的一个内在原因是儒学内部返汉回内，使经学考据必然旁及诸子典籍）发展向汉学回复的朴实考据、训诂的古文经学。“这种复古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步抛弃察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15]

经学在清初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由于清廷实行和强化了封建专制对文化发展的高压政策，促使着由经世致用的经学蜕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迄考据终的复古学派，即乾嘉学派。

二、乾嘉学派的兴起

1. 乾嘉学派的形成

清初所倡导经学由批判理学思潮经戴震，进入考据学狭路的是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人。迄乾嘉初叶，江苏惠栋崛起，潜心经术，专宗汉儒，独以表彰汉学为职志。他说：“汉经师之学，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辩，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章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能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6]至此，以汉学标榜的乾嘉学派，遂以系统而娴熟的考据学，登上了清代中叶的学术舞台。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以经世致用的宗旨，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它又是一个具有复古倾向的思潮。弘倡经学考据，同时清代中叶的封建盛世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相对稳定，为知识界的经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他们运用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发明，开展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潜心努力，形成了清代经学的高峰，即乾嘉考据学。

由于它兴起清代中叶的乾隆嘉庆年间，故又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分为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其中以戴氏为首的皖派的考据学最为著名。它主张承继汉学中的朴实考据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那么究竟什么是乾嘉学派所主张的古文考证据呢？它“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17]胡适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乾嘉考据学作了概括，他也认为二义：“一是认明文字的声音与训诂往往有时代的不同，一是深信比较归纳方法可以寻出古音与古文来，前者是历史的眼光，后者是科学的方法。”[18]

2. 乾嘉考据学方法

乾嘉学派把这种方法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类，皖派的开创人戴震指出：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等而末者也。……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将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19]

早期的戴震认为考证学中的义理第一，考据其次，词章居末。这与乾嘉考据学所形成的“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主流观点尚有差距，但他注意到运用这三途的最后，必须求其“大本”，即三者的相互汇通。后来戴震纠正了这个偏差，认为所谓理义绝不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而得之。[20]“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21]戴氏有“义理、考据、词章”三分法对后来的章学诚影响很大，他认为“考证即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具”虽是以义理为主，但也应考证与文章为辅，显然，章氏在考据与义理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发展了戴震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不能“空言义理”，“必博学以实之”[22]，而应把义理合成一体。章还主张把考据学从戴震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可用的相对独立的学问。他指出，古代并没有考订学，只是“官师秩守，百家繁兴，述事而成真伪，论理而有是非，学者生承其后，不得不有所辩，以专一是。而辨别又不可以空言胜也，则推此证彼，引事世理。”[23]才产生了考据学。

无论是戴氏还是章氏都不可能把考据学从儒学的程朱“义理”所笼罩下的理学中独立出来。真正独立的考据学应摆脱程朱义理的纠缠，在顾、戴之后的考据学派的“巨擘”，当数朱筠和钱

大昕。因为在他们心中的义理只虚存其目的名词而已，真正的学术方法只有考据学一门，正如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中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24]

义理不可能独立自存，义理是通过训诂之后才可获取，而事实上，阮元也是寻着这一理路进行纯考据学研究的。他善于动用归纳、比较研究来寻出文字训诂的知迁。他深知文字是随时代变迁的，认为以归纳搜集证据再比较，才可以使我们知道文字诂义与原来的价值。阮元本着这些方法撰了《经籍纂诂》。

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方法是在长达 300 百年的过程中形成的，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重佐证、重证据、示古训、戒妄牵。

第二，不以孤证定结论。不仅讲究以经证经，而且注意广为搜寻相关的旁证，不隐匿反证，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就是“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砭这定说，遇有反证则弃之。”[25]

第三，注意寻求训诂校勘的通例。“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26]，以推求出他们的共同涵义来，这就是所谓“以经解经”，“通经以通一经”。显然这种方法就是归纳方法，它是乾嘉考据学的根本方法。

第四，注重寻源溯流，认清文字的音、形、义的时代不同与承继意义。他们论字本于《说文》，治经本于古训，论音是为了知古今音的不同，以力图根据最古的训诂，把古学还诸于古学，忠实于古学。

3. 乾嘉考据学的贡献与特长

乾嘉考据学的巨大学术成就远不在于他所提出的考据学的方法本身，它的巨大成就可以归纳为一点：即运用其考据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精心整理。从校订经书，扩大至考究历史、地理、历算、方志、谱牒、音律、典章制度，均卓有成效。乾嘉学派有搜集、鉴别、解释、整理古籍和史料方面尤为客观、精密、细致，则否定主观的臆说、穿凿附会到审定证据；由归纳到比较引申；或由校勘而纠正古书传抄刊刻的伪谬，~~逻辑~~逻辑旧书以免名著失佚等方面，而近代参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奠定基础。“有这种方法去治古书，其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27]一时间，“几乎独占学术界”，呈现一种“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28]具体来讲，乾嘉考据学的贡献与积极意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乾嘉考据学用考据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北宋至近代 500 年的理学价值，欲开始打倒旧理学，建立新理学，促使他们一方面而批判旧理学的空谈性理，又囿于朱、王之学；另一方面，他们在否定王学而复兴朱学，由弥补朱学的不足，而追踪汉学，面广为研究与古代儒学并存的诸子之书，导致了诸子学的复兴，推动了古代学术^近近世学术研究的转化，为墨学复兴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二，乾嘉学派独创了近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带来了近世学术范式的革命。乾嘉学派精于音韵、训诂、文字、校勘等，看似微观研究，但它不以先见之理而强行断之。在根本目的上，则是为了弄清“事理原委隐曲”，它可能在表面上借鉴了朱熹和汉学经学家的某些方法，但在总体上，它是中国古代学术方法的逻辑继承和必然发展。它不仅是对包括汉儒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智慧资源的凭借、吸收的采纳，而且它在古学的冲者击下，讲究立论有据、无征不信，使用的是完全合乎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使它以前的学术研究上的直观感悟、经典演绎式的思维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说在传统的经史之学的领域内发起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革命。梁启超对此有所论述，他说：“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29]梁氏之言丝毫也没言过其实。近代文化史表明，大凡治过诸子之学的近代学者，如汪中、毕源、孙诒让、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十分熟

于乾嘉考据学方法，才得以对包括《墨学》在内的诸子典籍，进行精细的校勘、诂释，考辨作者、篇什、事迹的源流，为进一步研究诸子，尤其是墨辩的学说，义理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4. 乾嘉考据学的局限性及其影响

尽管乾嘉考据学取得了近世学术中的巨大成就，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之后的学术研究（如《墨辩》的研究）。它在两个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乾嘉考据学是经学考据的余藩，所谓“经衍未具，参以诸子”，目的还是为了考订儒家的经义。乾嘉学派的学者仍多为清儒，他们在考据学的学术研究中的非儒倾向，只不过是内部的派系斗争。只有当他们彻底摆脱儒学的影响之后，乾嘉考据学才能成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学，也才能客观地、独立地研究诸子，使中国古代文化得全面的整理与总结。

第二，乾嘉考据学过于偏重考据、训诂、校勘，而忽视了义理。就连生于乾时代的章学诚也批评说：“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30]“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31]后来的胡适也批评了乾嘉学派的局限，他指出：他们人人都研究小问题，做专门研究，专校一本书，专治一本书（如《说文》），或专做一件事，风气虽逃虚就实，但却细碎枝叶，而治古书之法有三：校勘、训诂、贯通。清儒精于校勘训诂，因注重功力而忽视理解。达到义理贯通。正由于乾嘉考据学的这种倾向，才使得“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32]

由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方法风靡达三个世纪之久，作为一种广为流行的学术范式势必制约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的状况，因此那个时代的学术的内在限制也正是由乾嘉考据学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三、近代诸子学

1. 乾嘉诸子学的概况

诸子学主要是指以乾嘉考据学方法对先秦诸子（墨子、韩非子、庄子、惠子、公孙龙子…）的典籍及其学说进行校勘、注释和义理阐述的研究。乾嘉诸子学的形成导源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家们对宋儒“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等流弊的背离与舍弃。由于乾嘉考据学重用古训、古音、古本等客观的根据，去求经典的原意，就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于书，用之不参考互证的材料。虽然诸子学的初期也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但虽着大清王朝的渐衰落和西学的盛行，使对经书与于书的研究越来越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研究诸子学著名的学者傅山、汪中、章学诚、孙星衍、张惠言、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尤其是孙诒让为代表的诸子学者，竟用毕生精力研究诸子学。

诸子学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傅山（1607—1684）。傅山的学术研究富于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他博通经史诸子之书，以敢于冲破宋明理学的森严禁锢，大胆以“异端”自居，尖锐地抨击了“子不台经”的正统编见。他因此对《六经》和诸子作了无所轩轻的评注与阐释。对于诸子书中的一切文义玄奥的著作，他“逐字名为之，积累面疏之，以求其通”[33]，或训诂字义，或阐释义理，以诸子书互引、互证，多方比较，力求真义。紧终使许多晦涩难解的子书初步可读，他的子说研究研究虽然也有许多纯属牵强附会的妄自发挥，但他首开了以子学方法研究诸子学的先河，尤为令人注目的是，他开了后世汪中、毕沅等校注《墨辩》六篇的先河，成为近世研治《墨辩》的第一人。

汪中（1744—1794）是倡导诸子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述学》，其中的治子学的论文有《荀卿子通论》、《老子考异》、《吕氏春秋序》、《墨子序》、《墨子后序》等。其《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不功于诸经”，汪中敢把孔荀并称，否定了儒学为正统的概念，否定了宋儒的道统说。汪中的《墨子序》更喊出了反对独尊孔学研究子学的时代强音，他说：